

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贾国雄

[摘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进程客观存在前后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各自特色鲜明,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战略部署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富强梦”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重在资源积累的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前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都属于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的演进一脉相承。

[关键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8—0206—05

作者简介:贾国雄(1972—),男,四川剑阁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四川 成都 611130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进程客观存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真正理解两个历史时期互相不能否定,首先需要理解两个历史时期存在的联系。经济史学家武力认为,“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应该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去看,应该放到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2049年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200多年历程中去看。”^[1]笔者深以为然。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拉长历史的镜头,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去看,放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虽然各自特色鲜明,但都是新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多个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内在统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之

门,同时也使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复兴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把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生活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长剧正式拉开了序幕。

要在一个“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必将是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告诫说,“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2](P.64) 远大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求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开始就把20世纪后半期乃至建国后一百年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P.390) 而在1956年9月党的

八大上,毛泽东进而认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2] (P. 124)}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各方面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我们一度对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估计变得过分乐观。“大跃进”时期甚至脱离实际地提出要在较短时期内“赶英超美”的口号,结果带来惨痛教训。“大跃进”的失败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后来多次指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4] (P. 301)}

既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那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上分步分阶段来进行。早在“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较明确的提出分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构想。他认为,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一百年,而这一百年要分几步来走,大概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二三十年会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才会真正有大成就。在“大跃进”之后,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发展分步走的设想被具体化到工业发展的安排上,明确了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这个“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 (P. 483)}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长远而又伟大的历史意义。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全国人民近三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联系实际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从建国初的20世纪50年代算起,“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6] (P. 16)}邓小平也曾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 (P. 371)}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在考虑新时期的经济发展部署时,仍然着眼于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大计。他们立足改革开放前已有的经济发展成果,参考前面提出的第二步经济发展目标,把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又具体化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在这里,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经济发展目标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百年预期”都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是对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的“两步走”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已经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后期提前完成。当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转到了实施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战略部署上。1997年9月,为了确保更好的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世纪的十余年来,我们的发展战略正在稳步实施。2012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也再次确认了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百年“富强梦”的后半程,也是最终实现的阶段。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和战略部署始终未发生根本改变,虽然在不同时期具体表述有一些差异,那只不过是与时

俱进地对目标与步骤进行不断完善和丰富。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战略部署本质上都统一于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幸福安康的百年中国“富强梦”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准备了条件

如果说,从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统一性,那么,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因果关联性。

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在赶超经济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滞留于前工业化时期的落后国家要开始现代化进程,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关键步骤:一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阻止传统社会的生产剩余被其他国家劫取而外流,以便为自己获得积累经济发展资源的权利,从而取得工业经济发展起步的资格。二是进行土地改革,将农业生产中的收入“从会把它在奢侈生活中挥霍完的人的手中,转移到从事生产的人的手中。”^{[8] (P. 31)}进而借助国家的强制力,尽可能多而快的把农业的生产剩余转移到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中,实现整个国家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奠定国家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为经济的起飞作准备;三是依托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经济发展资源,适时的推进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建立一套鼓励和保障各种社会资本良性循环的有效制度,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些关键的步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前一个步骤即使不是下一个步骤的充分条件,也至少是必要前提。这一规律,既可以用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罗斯托等发展经济学家的“经济起飞”理论来解释。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有组织的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开始,60余年的经济建设也大致经历了上述的起步、积累和起飞等几个关键步骤。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从而为中国取得了现代化发展的起步资格。在接下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等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也大致

相当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步骤,也就是为中国经济的起飞积累条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而又高速的发展,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而且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还在持续,这大致相当于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关键步骤,也就是经济的腾飞阶段。在新中国这六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积累阶段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重在经济发展要素的积累,它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任何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9] (P. 279)}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实现持续而又高速的发展,也必须要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积累和物质资源的积累。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正是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实现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积累。

人是主要生产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余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口数量也长期停滞于4.5亿左右。在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间,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再加上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总体上实行的是较宽松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迅速增加。到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增加到8亿多,增加量大约为4亿,为中国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储备。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前出生的数量庞大的人口,因为有社会主义民生政策的保障,大多数都受过初级或者中级的学校教育。到1978年,中国总人口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超过80%降低到了35%以下。相当一部分人还有过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民公社生活或者劳动的经历。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虽然身份是农民,却受到工人一样的管理和纪律约束,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工人”,这就使得中国农民还没有离开土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适应被组织和管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顺利的转型为“农民工”提供了便利。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首先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起飞提供了人力资源积累。由于中国的劳动者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能较快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管理方式,所以,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也

自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有了人的要素,还需要有物的要素。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时,本就贫弱的经济饱经战乱之苦,显得残破不堪,工业基础尤其薄弱。即使到1952年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时,也只有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星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而其中还属于手工生产的轻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72%之多。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非常低,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中国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发展还需要物质资源的积累。

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始终把经济发展资源的积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工业生产中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经济积累中生产性积累优先于非生产性积累。这种经济政策具体反映在经济增长数据上就是属于生产资料性质的重工业产品增长非常迅速(见表1)。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到1977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4.8%,而其中重工业又占工业产值的56%。至此,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基本实现,中国经济起飞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积累也基本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民生经济部门上来。随着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改革开放前所积累起来的经济发展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能量得到释放,中国的经济爆发出强劲的发展后劲,实现了厚积薄发的增长效应。

表1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我国生产资料类
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倍数比较^①

倍 数 比 较 年 份	产 品	钢	煤	石 油	发 电 量	化 肥	水 泥	硫 酸	发 电 设备	碱
1978 年/1953 年		23.5	9.4	236.5	35.6	222.9	22.8	34.8	806	11
2003 年/1978 年		10.1	2.7	1.6	7.4	4.8	13.7	5.1	7.6	7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演进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各自特色也影响着经济体制的选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渐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两

个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存在因果联系一样,看似大相径庭的两种经济体制转型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演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走上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可控的改革开放道路,使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1979年12月2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0] (P.236)}这一原则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被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开始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不做计划,而是通过市场来调节。这对于高度集中的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突破。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1] (P.201)}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总体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演进过程是与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的积累阶段,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需要把社会的生产剩余(主要是农业剩余)悉数转入到需要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去,以便从无到有构建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几乎是强制式的资源流动,非市场经济体制所能胜任,只能由一个强大的社会控制中心,通过由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实现这种资源的“非等价”流动。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干预型经济体制的一种极端模式。在这一体制下,国家不但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实际上也控制着民众的消费,成为一切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国家通过少而平均的方法使全体民众的生活消费保持在能够基本维持生存的状态(有时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从而尽可

能把生产的剩余转移到需要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去。

极端的经济体制常常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历史条件的改变也常常会要求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数量有限,规模也相对不大,再加上民众建设祖国热情特别高涨,所以,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需要的资源配置和劳动者的激励相对容易满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总体上也是可行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起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增长。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到起飞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大多数的重工业部门已经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发展了,即使是轻工业部门,也可以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相对巧妙的方式来获得发展的资金,不必依靠政府来强制剥夺农业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重点已经由几个重工业部门转变为满足民生需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民众对于各种消费资料和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轻工业和服务业的部门众多,要收集和处理这样庞大的信息以进行经济的计划工作,即使对于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增长成为各部门的正常现象之后,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创新活力,自然地趋向于建立一种富有弹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在此条件下,形成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并且主要是为现代化积累提供保障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表现出诸多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对这一体制的转型提出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公有制经济之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很快就发展起来。多种所有制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活跃的商品经济变得活跃,市场运转所需的基本软硬基础设施逐渐齐备,各种市场渐次运转起来。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慢慢地转型成为了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通过渐进式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全盘否定,更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扬弃。它既有对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些过

时或者“过头”的制度设计的摈弃,也有对其中一些合理因素的继承和发扬。正因如此,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政府强而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经济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以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的主导与控制。至于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所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更是无时不在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这样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只不过改革开放已经把原来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的极端模式改革成为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的一般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发展成就举世公认,这既是改革开放前 30 年经济发展资源长期积累之后的厚积薄发,更是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发挥了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制度优势,让改革开放前已经积累起来的各种发展资源得以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成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体制演进在本质上一脉相承。

注释:

①表中相关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参考文献:

- [1] 武力. 从二百年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5).
- [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 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6] 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美) 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收稿日期:2014-06-05 责任编辑 杨春蓉